

#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乡村“π型”融媒体人才培养：角色、困境与协同创新机制

高丹丹 刘岚君

滨州科技职业学院

**摘要：**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乡村融媒体人才的培养赋予了新的时代命题。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标志着我国乡村建设从规模扩张走向质量提升与深度应用的新阶段<sup>[1]</sup>。在这一转型中，融媒体人才作为连接数字技术与美丽乡村的桥梁，其培养模式创新有效落地直接关系到数字红利能否真正惠及乡村。本文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背景，揭示融媒体人才作为数字乡村核心要素的动力定位；在此基础上，构建“技术为基、乡村为本、跨界为径”的新型职业教育模式，培养深谙乡村规律、擅长资源整合的“π型人才”，实现乡村振兴发展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有效对接，并结合多地实践案例，论证融媒体人才对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赋能机制，为乡村人才振兴与数字融入政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数字鸿沟；融媒体人才；乡村振兴；“π型”培养模式

**DOI：**10.65976/3080-0374.2026.08.038

## 引言

数字技术的无死角渗透正在重构中国乡村的发展图景。自2018年“实施数字乡村战略”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以来，我国已构建起数字乡村建设的四梁八柱。截至2025年底，我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2.04亿户，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69.2%，城乡数字接入差距不断缩小<sup>[2]</sup>。然而，从“接入鸿沟”到“使用鸿沟”再到“能力鸿沟”，乡村数字鸿沟的形态正在发生深刻位移。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写入文件。至此，我国数字乡村工作重点从广覆盖向高质量、深应用持续转变。在此背景下，一个关键命题浮出水面：当硬件设施日益完善，谁是推动数字技术真正扎根乡村、激活内生动力主体？大量案例让我们认识到，技术下乡不等于数字红利自动惠及。基础设施铺设之后，数字技术能否有效转化为农民的生产工具、治理工具和生活工具，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支既懂技术又懂乡土、既能生产内容又能链接资源的融媒体人才队伍。

然而，当前乡村融媒体人才培养面临多重困境。首先，培养目标偏重理论化、城市化的课程体系与乡村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其次，当下的专业教育与真实的工作场景严重脱节，缺乏懂乡村、爱乡村的在地化融媒体人才；最后，多元化主体联动的制度缺失也使得协同机制与可持续发展出现断裂现象。而矛盾的本质，直指人才培养体系未能有效回应

乡村振兴对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需求。因此，本文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分析视角，聚焦融媒体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性创新，提出“π型”人才定位、“技术+人文+乡土”融合、“校地企村”共育的人培模式，以期破解乡村数字鸿沟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下数字乡村的发展图景与人才新需求

(一)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及其对乡村发展的重塑逻辑

“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抓好“三农”工作的关键之举和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答题<sup>[3]</sup>。从理论内涵看，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新型生产力形态，它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的时空限制，实现了生产要素的智能互联和高效配置。

在乡村发展语境下，新质生产力的加持引发了多维度的重塑效应。数字技术的深度渗透使乡村产业从单一的新闻传播延伸至农村电商、智慧农业、文旅推广、品牌打造等新业态，推动农业从传统粗放型向精准智能化方向转型。在治理层面，新质生产力通过高效的信息处理手段、促进产业融合创新、提升治理效率等方式，为乡村治理数字化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在文化层面，数字媒介对传统文化符号的数字化转译和场景化传播，促进了乡风文明的活态传承。更进一步的变化在于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变革：数字平台打

破了城乡之间的地理空间限制和信息壁垒,使城乡之间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得以自由流动,成为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融合的新通道。可以说,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经济的增长逻辑、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和文化传播的动力结构。

## (二) 数字鸿沟的乡村形态演变

从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来看,当前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正是“数字应用鸿沟显著”。数字鸿沟是一个多层次、动态演变的概念。早期相关的研究聚焦于数字接入鸿沟,也就是城乡之间在信息基础设施上的差异。近些年,随着我国宽带网络在农村地区的加速普及,其焦点逐渐转向使用鸿沟和能力鸿沟。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已从接入层面的“一、二级数字鸿沟”深化为应用层面的“三级数字鸿沟”,涵盖数字接入、数字使用和数字成效三个维度。但部分地区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忽视了城乡居民数字素养的差异,项目设计脱离农民的实际需求和接受能力,导致农民参与感和获得感较弱。因此,造成农村地区在数据生产资料的获取上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有效参与到技术循环体系中。农民数字素养的分层提升既受制于基础设施、教育资源与制度供给的约束,又通过应用创新反作用于鸿沟的缩小。这一辩证关系揭示了一个关键命题:破解乡村数字鸿沟,核心路径不是单向的技术输送,而是数字能力的双向共建。而这一路径的枢纽,正是能够嵌入乡土社会、完成“最后一公里”转化的融媒体人才。

## (三) 乡村振兴对融媒体人才的能力结构需求分析

新质人才是驱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变量。在数字技术深刻重构农业生产方式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当下,新质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数字技术,更需要具备将技术与乡村场景深度融合的能力。复合型融媒体人才既掌握数字内容生产、传播渠道运营、数据分析应用等核心技能,又能够深入理解乡村的文化脉络、产业特点和治理需求,是将数字新质生产力转化为乡村发展实效的关键中介。

复合型融媒体人才之所以能够成为破解数字鸿沟的关键力量,是因为其与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耦合。乡村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核心困境之一是城市的技术供给与乡村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信息黑箱”现象。而复合型融媒体人才能够将技术语言“翻译”成农民可理解、可操作的内容,同时将乡村的真实需求反馈到技术和政策供给端。此外,融媒体人才的核心能力在于内容策划、生产与传播的赋能效应。在当下“内容为王”的数字经济时代,优质的数字内容是乡村资源

价值化的关键媒介。无论是农产品直播带货、乡村旅游推广,还是乡村文化传播,都需要高质量的融媒体内容作为载体。融媒体人才通过内容生产,能够将抽象的“数字赋能”具象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获益的日常实践。同样地,在社群动员的组织中也发挥了本身专业独特的优势。他们往往嵌入乡村社会网络之中,与农民形成基于信任的社会关系。这种嵌入性优势使其能够更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参与数字实践,比外部技术人员更具亲和力和说服力。以“乡村新媒体CEO”的闽江模式为例,该模式以“服务地方、赋能乡村”为导向,前瞻性地将人工智能引入融媒体人才培养,重点培育学生的智能内容生产、智能渠道整合、智能用户洞察、智能效果优化四大新能力<sup>[4]</sup>,为破解乡村数字鸿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 二、融媒体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困境与供需错配

### (一) 融媒体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赋能作用

融媒体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数字桥梁”的关键作用,其效应体现在多个维度。具体而言,融媒体人才在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中承担三重理论功能:第一,要素激活功能。通过数字内容生产和传播,将乡村特色的特色农产品、文化资源、生态景观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流通、可交易的数字资产;第二,能力赋权功能。通过融媒体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和知识普及,提升农民的有意识的参与能力,将“数字弱势群体”转化为“数字共建者”;第三,生态构建功能。作为连接政府、企业、高校和农民的多维节点,融媒体人才能够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构建数字乡村发展的“生态圈”。这三重功能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融媒体人才本质上是以“人的新质化”驱动“乡村的新质化”。例如在创设“丽水山耕”品牌中,融媒体人才深入挖掘丽水生态、农耕文化故事,通过高质量的纪录片、短视频、图文报道,为旗下的农产品注入“生态、健康、匠心”的品牌灵魂,成功将分散的农户和农业主体组织起来,促进了农户与市场的有效对接,提升了丽水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sup>[5]</sup>。

### (二) 主体缺失与人才流失的实然困境

尽管融媒体人才的赋能效应显著,但乡村中“主体缺失”问题依然严峻。从数量上看,乡村人口空心化导致在地人才总量严重不足,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普遍面临人才匮乏的现实困境。从质量上看,留在乡村的传播主体普遍存在数字素养不足的问题,面对新技术、新平台缺乏熟练操作的能力和心理上的适应性。同样,受薪资待遇、职业发展通道、生活配套条件等客观因素制约,以及“都市偏好”主观认知因素影响,当前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意愿不强,即使短期进入也

难以实现长期扎根。这导致了乡村融媒体人才储备的持续“失血”状态。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传播主体的“悬浮”，也就是一些县级融媒体中心虽然在物理空间与制度架构上已然存在，但在功能落地、关系构建与意义共鸣等层面，仍与乡村社会的真实需求和生活逻辑若即若离。这种“在场的缺席”现象意味着，融媒体机构即使建成了、人才即使下沉了，若不能真正嵌入乡村社会的肌理，其赋能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三) 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结构性错配

如果上述主体缺失与人才流失问题是“量”的不足，那么当下融媒体人才培养模式与乡村振兴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则是“质”的脱节，并且后者影响更为深层、隐蔽。

#### 1. 供给端：高校人才培养与乡村实践场景脱节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融媒体专业沿袭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对乡村融媒体工作涉及的农业知识、农村政策、乡土文化、受众差异等教学内容几近缺位。不少学生毕业后面对的是会做内容但不懂乡村的尴尬处境。与此同时，也缺乏对乡村社会的深入了解和情感认同，难以适应乡村传播工作的特殊要求。传统“课堂讲授+理论考核”的培养模式已难以适配行业与乡村振兴的双重需求。我们不难看到，城乡差距并非简单线性收敛，而是呈现相对收入比趋近与绝对额扩大的“收敛悖论”以及农村内部“数字贫富沟”加剧的分化特征，这一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了高校人才供给与乡村实际需求之间的错位。

#### 2. 需求端：基层对融媒体人才的复合能力要求

高校融媒体类专业课程体系以主流媒体需求为导向，以学科划分的线性培养模式为主。地方院校嵌入乡村振兴的人才培养体系松散，课程设置“在地化”特色不足，造成整体协同性不强、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的局面。这些因素也加深了乡村数字化治理体系面临城乡数字鸿沟未弥合、数据共享应用效能不足、治理主体能力与参与度欠缺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基层对融媒体人才的要求不再是单一的“新闻采编”能力，而是要会拍、会剪、会播、懂运营、会数据分析、社群动员、项目管理于一体的复合能力。这与我们文章后面提出的“π型”人才不谋而合。因此，在基层新媒体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应涵盖融媒体助力乡村振兴实践、新媒体文旅项目打造、短视频摄制等多个模块，正是对这种复合能力需求的有力回应。

#### 3. 结构性矛盾：供需错配的深层原因

供需错配的深层原因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矛盾。

第一，培养逻辑与需求逻辑的不匹配。目前，高

校传媒类知识体系与技术标准几乎完全对标城市商业媒体与互联网大厂的需求，其培养遵循学科逻辑和知识逻辑，追求课程体系的系统性和理论的前沿性。而乡村振兴需要的是问题逻辑和实践逻辑，要求人才能够解决具体场景中的真实问题。两种逻辑之间缺乏有效的转换机制。

第二，技术逻辑与乡土逻辑的冲突。数字技术遵循的是效率逻辑和标准化逻辑，而乡村社会遵循的是关系逻辑和人情逻辑。单纯的技术导入往往忽视乡土社会的文化惯习和关系网络，导致“水土不服”。融媒体人才培养如果不能同时兼顾技术能力和乡土嵌入能力，就会陷入“懂技术的不懂乡村、懂乡村的不懂技术”的两难困境。

第三，短期培训与长期育人的矛盾。当前各地开展的乡村融媒体人才培训多为短期、项目式、一次性投入，缺乏系统化、常态化、可持续的培养机制。湖北省计划在2026—2027年培育10000名“乡村主播”骨干人才，这一大规模培训计划固然令人振奋，但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建立与高校、企业、媒体协同的长效育人机制。

上述分析表明，破解乡村融媒体人才困境，不能仅靠增加人才供给的“增量思维”，更需要以系统性改革重构人才培养的价值导向和能力模型。这正是“π型”人才模型提出的深层逻辑。

### 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融媒体“π型”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 (一) “π型”人才模型的内涵与构建原则

激发乡村创造活力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融媒体人才正是这一维度的关键承载者。这里说的“π型”人才模型源于早期对“T型”人才模型的深化与发展。在智媒时代背景下，“π型”人才被界定为具备“纵向专业深度、横向跨学科广度、斜向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中，两条纵线代表在至少两个专业领域形成纵深能力，横线代表跨界整合与融通创新的素养。

在乡村融媒体人才培养的特定语境下，“π型”人才模型需要做出适配性重构。本文提出，乡村融媒体“π型”人才的两条纵线应分别指向技术实操能力和乡土认知能力两大核心领域。技术实操能力涵盖全媒体内容生产、平台运营、数据分析、智能工具应用等技能维度；乡土认知能力涵盖农业知识、农村政策、乡村社会运行逻辑、地方性文化理解等知识维度。而连接两翼的“横梁”则是人文情怀这一将技术技能与乡土知识有机融合、转化为有温度的乡村传播实践的价值引领力。这一模型的构建遵循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在地化原则，即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和能力标准必

须与乡村传播的实际需求精准适配；二是复合性原则，即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媒介技术、农业知识、文化素养的跨域融合；三是实践性原则，即将人才培养嵌入真实的乡村传播情境，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锻造能力。

## （二）“技术+人文+乡土”复合能力培养模式

“技术+人文+乡土”融合是乡村振兴对复合型融媒体人才培养的核心要求。这一模式回应的是“既要懂技术、又要有人文关怀、还要扎根乡土”复合能力的培养。基于上述“π型人才”模型，乡村融媒体人才的复合能力培养应从三个维度系统展开。

首先，在技术能力培养维度上，应突破传统传媒教育单一媒介技能的局限，构建涵盖智能渠道整合、数字内容生产、全媒体平台运营、数据驱动传播、数据分析应用的全链条技术课程体系。重点培育学生内容优化、用户洞察、效果转化三大创新能力，为“π型人才”培养奠定核心基础。在实践中把乡村田野作为“移动课堂”，让学生在真实的乡村场景中完成从理论学习到实战演练的全流程训练，构建“理论+实操+田野”的三段式教学模式。将专业课程与乡村实际需求相结合，同时打破传统课程结构，增设“乡村传播学”“数字乡村治理”“农产品电商运营”“乡土文化数字化保护”等特色课程。

其次，在人文情怀培育维度中，应将“三农”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着重塑造学生的人文素养和价值关怀。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学子“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sup>[6]</sup>。”这不仅是开设一两门相关课程的问题，而是要在专业教学、实践锻炼、价值引领等多个环节系统融入“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价值导向。此外，我们应深刻认识到数字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工具，其在乡村应用中必然涉及文化传承、伦理规范、社会公平等价值命题。融媒体人才需要理解乡村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传播实践中尊重乡土文脉，避免“消费乡村”的工具化倾向。鉴于此项考虑，教师也应与学生共同在乡村一线锤炼本领、厚植情怀，能够有效实现人才培养与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

最后，乡土维度指向融媒体人才的在地化嵌入能力。这包括对乡村产业特点、社会关系网络、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以及对农民真实需求的敏锐洞察。乡土维度不仅是知识层面的认知，更是情感层面的落地认同。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在培养特色艺术人才时，构建的“情—技—韵”三阶融通模式，正是以乡土情感培育为起点的有益探索<sup>[7]</sup>。该模式有效解决了乡土情感缺失、技艺传承断层等问题，形成了一条可推广的育人新路径。他山之石，能够为我们融媒体专业带来新的启示。在乡土认知能力培养维度，

不仅要讲农业知识、农村政策、乡村文化等“在地化”内容系统纳入课程体系。还要组织学生通过驻村实践、乡土文化调研、新农人经验分享等，将乡土情感教育贯穿始终，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融媒体人才。

## （三）“政校企村”四位一体

高校单一的育人主体难以承担乡村融媒体“π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针对前面所列矛盾的破解之道，在于重塑人才评价的价值坐标，打造多元协同参与的育人格局。“政校企村”四位一体协同机制的核心理念在于：以政府政策为引领、以高校教育为主阵地、以企业实践为支撑、以乡村需求为导向，形成育人资源的闭环流动和良性循环。

各地政府部门已出台多项人才引进与激励政策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同时在这一机制中承担政策引领和资源统筹的角色。高校发挥人才培养的专业优势，不仅要讲教学内容与乡村需求深度对接，还应建立企业导师库和案例库。邀请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电商平台运营专家、知名乡村主播等担任特聘导师，将真实的乡村产业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企业提供真实项目和岗位实践，将行业前沿的运营规则和技术工具引入教学过程，是人才培养的场景提供者 and 需求牵引者。乡村则是需求提出方和实践检验场，其产业发展、文化传播、社会治理中的真实需求反向重构教学逻辑。

四位一体的关键在于强调价值的共生与利益共享，打通资源壁垒，实现要素的顺畅流动。高校的理论知识通过乡村融媒体中心与实践平台转化为学生的实操能力，企业的市场需求通过高校的课程设计反哺人才培养，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为整个系统提供制度保障。这一路径的本质，是将传统上分属不同系统的育人资源重新整合，形成以乡村振兴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安徽桐城市的实践生动诠释了“四位一体”的运作成效：该市由组织、宣传部门牵头，联合融媒体中心、农业农村局、人社局、商务局等职能部门，构建市级统筹、部门联动、镇街协同的立体化培育体系，累计培训乡村推介官及后备人选 860 余人次，实现了从“选才”到“育才”再到“用才”的全链条贯通。

## （四）“项目制”驱动教学

“项目制”驱动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更是连接“政校企村”四方的机制枢纽。其核心要义在于针对传统先学后用的学习模式的改革。它将教学中心从学科知识体系转移到真实的乡村传播项目中，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教学目标，围绕典型品牌打造、非遗数字化传承、乡村文旅路线推广等真实需求，实现“教、学、做”的有机统一。

项目制教学具有三重优势。第一，打破课堂与田野的边界。学生不再在模拟场景中练习技能，而是教学重点跟着农时走，在真实的乡村传播情境中直面复杂问题。在我们的项目实践中，冬枣季学水果类短视频拍摄，棉花收获期侧重经济作物农产品推广，盐田大虾上市时主攻生鲜农产品直播技巧。将教学内容与乡村生产节律深度契合，使学生获得的不仅是问题解决与技术技能的提升，更是对乡村生活的深入理解和情感连接。第二，促进多专业协同。乡村传播项目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一个助农直播项目同时涉及内容策划、视觉设计、数据分析、供应链管理等多元任务，必然要求多个专业的学生组建团队协同作战。邵阳北塔区的产教融合项目印证了这一点：一支由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视觉传达设计、动画设计四个专业师生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围绕油豆腐、生态土鸡等农产品，开展从市场调研到营销推广的全链条服务，“一个项目贯通、多个专业协同”的模式实现了教育链、人才链与乡村产业链的有机衔接<sup>[8]</sup>。第三，推动成果的有效转化。项目制教学产出的不是仅供评分的“作业”，而是能够直接服务于乡村发展的短视频、品牌策划方案、直播营销活动等传播产品。学生在“调研—策划—创作—发布—运营—复盘”的全流程中，综合运用“π型”能力，解决真问题，创造真价值。

#### 四、结语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乡村“π型”融媒体人才培养在缩小乡村数字鸿沟、推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文本中多项育人模式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在多地实践中得到了初步验证和丰富发展。复合型融媒体人才本质上是以“人的新质化”驱动“乡村的新质化”的关键中介，其培养模式创新直接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深度与成效。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与在乡村的加速渗透，融媒体人才的能力要求将持续提高。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聚焦以下方向：一是融媒体人才培养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路径；二是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乡村对融媒体人才的差异化需求及适配策略；三是融媒体人才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角色拓展和功能深化。当越来越多的融媒体人才从城市回流乡村、从“被动学”走向“主动闯”，中国乡村的数字鸿沟终将不再是无法逾越的天堑，而成为激发内生动力、实现跨越发展的

的跳板。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EB/OL]. (2026-02-23) [2026-04-24]. [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2/content\\_7005160.htm](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2/content_7005160.htm).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5年通信业统计公报 [EB/OL]. (2026-01-26) [2026-04-24]. [https://www.miit.gov.cn/jgsj/yxj/xxfb/art/2026/art\\_bea806f4dd20457cb0158795cc210aa7.html](https://www.miit.gov.cn/jgsj/yxj/xxfb/art/2026/art_bea806f4dd20457cb0158795cc210aa7.html).
- [3] 习近平.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J]. 求是, 2024(11):4-8.
- [4] 闽江学院新闻传播学院. 以教学改革育“乡村新媒体CEO”摄影展呈现实践新成果 [EB/OL]. (2025-12-15) [2026-04-24]. <https://www.mju.edu.cn/2025/1014/c1437a209183/page.htm>.
- [5] 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丽水山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区域公用品牌实践 [J]. 浙江农业科学, 2021, 62(10):1897-1901.
- [6] 习近平. 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的回信 [N]. 人民日报, 2023-05-04(1).
- [7]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课题组. “情—技—韵”三阶融通：地方师范院校特色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 [J]. 湖南教育 (C版), 2024(5):42-45.
- [8] 邵阳学院. 北塔区产教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与实践 [N]. 湖南日报, 2025-09-10(7).
- [9] 胡鞍钢, 周绍杰. 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3):34-48.
- [10] 邱泽奇, 张树沁, 刘世定, 等. 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0):93-115.
- [11] 李明德, 刘婵君. 智媒时代新闻传播人才能力培养的目标、困境与出路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40(2):123-130.
- [12] 潘云鹤. 培养“T”型人才，适应社会需求 [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997(4):1-4.
- [13] 陈国权. 组织行为学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88-92.
- [14] 喻国明. 融媒体发展的战略逻辑与操作路径 [J]. 新闻与写作, 2019(1):59-64.